

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的应用研究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为例

张奂奂 高益民

摘要: 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使得批判话语分析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方法。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为例,运用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话语分析的三维模型,应用到大学章程文本的研究中,并借用语料库分析软件提出具体的操作步骤,从情态系统和互文性两个视角深入分析章程文本的语体、风格和话语角度,呈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格局。

关键词: 批判话语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情态系统;互文性

一、引言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语篇分析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CDA研究的队伍庞大、流派众多,其中以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创立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体系最具影响力,这一体系的主要理论来源包括社会批评理论和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因此,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将语言学上的文本分析同社会学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者既关注静态的社会情境,又突出动态的意义建构过程,真正做到了联系、发展地看待社会问题^[1]。

二、批判话语分析在大学章程文本中应用的研究路径

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包含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三个研究维度,即“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文本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实践是文本的生产分配消费过程,而话语实践是由社会实践所决定。以这三个维度为基础,费尔克拉夫提出了批判话语分析的三维框架^[2]。(见图1)该框架应用到章程的文本分析中大致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描述章程文本的语言使用和篇章结构特征。单纯的语言使用特征,可以描述文本的情态系统(modality)、及物系统、分类系统、名物化和被动化的运用以及隐喻表达。文本的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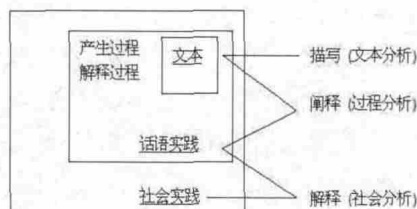


图1 费氏的三维分析模型

章结构特征,可以从章程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甚至章程文本内部的篇际互文性入手。同时,我们可借助 WordSmith 软件的语料库分析方法查询和统计大样本章程文本中的高频词,或使用语境共现检索(concord)功能查询搜索词(search word)的常用词丛搭配甚至可以扩展到该词丛所在的索引行。还可使用关键词(keywords)功能揭示文本中超常使用的词,即与某一标准相比频率显著偏高的词,偏高的程度就是该关键词的“主题性”(keyness)。这里需要说明语料库语言学中的主题词含义和传统上表示“重要”之意有所区别,它指在和参照语料库(reference corpus)比较时统计出的具有特殊词频的词^[3]。也即,一个词是否是某一文本的关键词,不是取决于该词在该文本的出现频率,而是取决于该词在与之相对比的参照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4],这种方法为研究和对比不同章程文本的主题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实证依据。

第二步是阐释章程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这是话语分析的关键环节。具体而言,依据章程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辨识其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①以及这三个要素在同一文本中的搭配组合,这是研究章

^① 语体主要是指表达者与他人的交往模式,突出了文本的行动功能;话语角度是表达者出于特定角度对事物进行的描述与阐释,也就是文本的表征功能;风格是表达者对其表达内容与视角所持的基本立场,体现了文本的身份功能。其中,文本的行动功能和身份功能对应的就是韩礼德的人际功能。

程文本的生产过程^[1]。表达权力和义务关系的情态动词可以体现章程文本的风格；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语法现象则可以反映章程文本的语体和话语角度,比如,被动化和名物化的运用可以将章程某些利益主体的行动抽象化或者把某些施事主体隐性化或者淡化。章程文本的分配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指章程实施的状况,研究章程文本和学校公布的年度报告或者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记录可以明确两者话语角度的呈现方式是否一致,以此来说明章程在执行过程中某些政策是否发生二次扭转。

前面两个步骤都是文本在说话,而最后一步是研究者在说话,研究者在最后一步需要解释章程话语实践过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话语实践受制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也构建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具有建构性又是被建构的^[5]。社会实践分析的目的在于解释话语实践为什么会是这样。章程文本的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是解释章程文本背后的多元主体权力配置关系形成的原因以及大学与政府和市场之间外部关系的确立是如何受社会变迁的影响。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分析被话语实践分析联系起来,话语实践充当了连接语言运用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这是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论体系的精髓所在。

三、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文本的批判话语分析

(一)理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情态系统的分析

章程文本的语言风格是对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再现,体现了教师、学生作为大学管理者参加大学治理身份的认同程度。章程制定者力图使用章程文本的语言风格去说服利益相关者和大众接受其设定的人际关系和勾画的权力格局,而人际关系的功能主要通过情态系统的表达来实现。本文运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情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章程文本情态动词的使用特征及其映射的人际意义。按照韩礼德对情态三种赋值的划分,shall, should等词的取值是中值,而may的取值为低值,must的取值为高值^[6]。

运用 WordSmith 软件的词频列表(wordlist)功能,我们发现在国大章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是 shall 和 may, 分别占文本词数百分比的 1.65% 和 0.85%, 其次是 must 和 should, 各占 0.07% 和 0.03%。词频分析结果见表 1。

国大章程重视大学内部组织架构的划分和人员的职权界定,通过使用高、中、低值的情态操作语来规约各个责任主体的权力和义务,理顺了大学内部治理

表 1 情态动词的词频分析

| 量值 | 情态表达 | 数量 | 百分比 |
|----|--------|-----|------|
| 高 | must | 14 | 0.07 |
| 中 | shall | 327 | 1.65 |
| | should | 6 | 0.03 |
| 低 | may | 168 | 0.85 |

结构。让我们首先讨论出现频率最高的 shall, 运用 WordSmith 软件的语境共现检索功能, 以 shall 为搜索词, 把词丛跨度设为 1 到 6, 能够最大限度产出 shall 的搭配词(collocate), 排在前几位的主要有董事会(Board)、学生(Student)和评议会(Senate)。

1. 学术评议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制衡。大学章程首先要明确规定大学的学术机构, 学术评议会是国大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负责管理大学的学术工作、规范并监管学生的纪律、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 可以和各个院系、研究所直接打交道。如, 章程 2 第二条, the powers of the Senate shall be to: (a) establish, organise, rename and dissolve Faculties and Academic Units; (b) ... 规定了评议会的学术权力: 设立、组织、重命名和解散学院、学术单位和研究所; 制定、审查和终止学术项目; 规范学生的入学资格, 出勤率; 任命并指导考官和考试委员会, 并监督考试; 授予、剥夺或撤销学位、学历、证书以及其他荣誉称号; 设立、审查和授予各种助学金; 颁发荣誉学位和名誉教授称号。再如, 章程 2 第五条, Every power or duty delegated ... shall continue to be vested in the Senate but shall be so vested concurrently in the Senate Delegacy, 其中 shall be vested 规定所授予的一切学术权力或职责属于评议会, 也属于评议代表团。此外, 章程中还规定了评议会和评议会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会议法定人数、任期和选举、工作程序等内容, 从而使得评议会组织具有合法性和规范性, 也保证了大学决策的民主公道。条例 1 第四条 (c), agendas of meetings shall be delivered seven Days in advance before the date of any such meeting to each person ... 规定了评议会的会议程序, 即评议会的义务: 应在任何会议召开前 7 日将会议通知和议程发送至有权投票的每位与会成员。

国大的董事会主要是引导和规范学生社团和活动, 确保学校的各项纪律得到落实, 并确保大学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章程 5 中提到: The Board of Trustees shall have power to make Regulations, rules ... 董事会有权制定规则、规定、政策和程序, 以管理学生会及其任何组成机构。The Board of Trustees ...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 在校长建议的基础上, 董事会有权对

学校历史赠与的规定进行更改。在涉及捐赠基金等财务事宜上,还设立了投资委员会以辅助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管理学校基金,以产生用于支持学校作为高等教育公共机构的相关活动的稳定收入来源。

权力制衡理论的经典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拥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不能过分集中,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独断专行的决策行为^[7]。国大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是平行的组织,同由大学理事会管理,是一种典型的两院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也是英美一流大学的主导治理模式。评议会主要负责学术事务,主要由教授代表组成;董事会的职能以管理为核心,负责行政和财务事宜,包括管理捐赠和基金以及学生社团等,主要由大学之外的人员组成(社会名流、企业领袖、校友代表、政府官员构成了董事会的大多数)^[8]。为了使整个治理过程更加公开和透明,评议会和董事会下设有许多附属委员会,分委会可以根据自己情况确定发展目标与作用,向评议会提出建议,它们分别是学校教育政策委员会、荣誉学位和名誉教授提名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其中纪律上诉委员会由一名董事会成员担任主席。

2. 学生纪律处分制度完备。将国大章程的文本建为观察语料库,美国三所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章程文本建为参照语料库,一般要求参照语料库的库容是观察文本的2倍以上。通过WordSmith软件的关键词检索功能对比两个语料库中某一关键词的主题性,发现观察文本中纪律(disipline)、申诉(appeal)、学生(student)这三个词的显著频率偏高,证明有关学生纪律处罚的规章制度是国大章程的一个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章程词频的主题性分析见表2。

例1: Any student who is alleged to have committed or attempted to commit..., may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r); an existing student of the University at the time the allegations of offences are adjudicated: (a)···(g);

例2: the student may, ..., appeal to the Dean of

表2 国立大学章程词频的主题性分析

| N | keywords | 1.Freq. | 2.% | 3.RC. Freq. | 4.RC. % | 5.Keyness |
|---|-------------|---------|--------|-------------|---------|-----------|
| 1 | DISCIPLINAR | 146 | 0.7387 | 0 | | 365.58 |
| 2 | DISCIPLINE | 103 | 0.5211 | 4 | | 226.3 |
| 3 | APPEAL | 83 | 0.4199 | 0 | | 207.64 |
| 4 | GIFT | 99 | 0.5009 | 9 | 0.0183 | 191.83 |
| 5 | STUDENT | 164 | 0.8297 | 104 | 0.2115 | 122.62 |

注释:1.观察文本的词频;2.观察文本词频的百分比;3.参照语料库的词频;4.参照语料库词频的百分比;5.主题性。

the corresponding Faculty...

例1是章程6第三条和第十条分别列举了可能导致纪律处分的18种情形和7种惩罚措施,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章程详细列举了纪律处分的依据:学术不守信,诽谤或殴打学生或教员;性骚扰或种族歧视;恶意投诉学校员工或学生;有损学校声誉;不遵守学校行政处分等。这些“不当行为”的明确规定为高校管理学生提供了详细可靠的法律依据,用以判断学生行为的适当与否,并根据行为不适当的种类和程度级别,采取对学生的不同程度的惩戒措施,比如罚款、公开谴责或者勒令退学等,从而避免了高校与学生的纠纷,达到了真正的“有章可循”。

国大通过章程的强制约束力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学生有义务遵守国大章程中的纪律规定。然而,通过例1和例2中may这个低值情态词的使用,我们发现章程也赋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申诉空间,即学生可以默许校方的制裁,也可以选择申诉,体现章程对法律受众主体学生权利的许可;如果教务长对其处罚有争议,可向其所在学院院长上诉(在学术单位负责人给其纪律处分的情况下)或向负责学生事务的院长上诉(在非学术单位负责人给其纪律处分的情况下),也可进一步向纪律上诉委员会呈递申诉报告。纪律委员会和纪律上诉委员会都会提前14天书面通知相关人员需要举行一个公平的书面和口头听证会,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时间准备材料抗辩。章程通过完备的上诉和听证制度,维护了学生作为学术共同体一员的合法权利,遵循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法律原则。

章程作为一个高校的根本大法,是高校制定规则的依据和阐述其作为独立法人使命的典范,这就要求其语言具有准确性和规范性,使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和义务一目了然,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也没有理解上的歧义现象^[9]。所以,在其语言中大量使用表示权力和义务的情态动词shall。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权力意志的高值情态表达成分must和should很少在文本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表示相对平和语气的中值情态词shall和低值情态词may,其原因可能是:shall通常表示应履行的义务和被赋予的权力,may本身含有一种“可以但不必须”的意思,通常表示主体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容易让读者产生认同感,而must和should表示应服从的命令,使文本从人际意义的角度给人一种居高临下和强迫的感觉,从而缩小了文本与读者的人际意义协商空间。劝说高校的各利益相关者以责任主体想要的方式自愿地行动,也就是通过语言营造认同感或至少是达成默许来行使权力,要比强迫

(coercion)更有效,这是一种缓和章程条文过于命令化、抽象化和非人格化的一种有效的语言手段^[10]。

卢梭(Rousseau)认为,一个人或组织无论有多么强大,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权力(power)转化成权利(right),把他人的服从(obedience)转化成义务(duty),是不能长久支配他人的。语言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国大章程通过两类表示义务与权力的情态表达式的使用,尤其是shall和may的多次重复使用,潜移默化地把主体自身的权力转化成权利,把他人的服从转化成义务^[11]。

(二)构建新型的外部治理格局——互文性的分析

“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的,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转化。”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把语篇的这一特性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12]。在她看来,每个文本好像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模仿和转化,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引用和相互吸纳。国内学者辛斌从读者或者分析者的角度把互文性分为“具体的”(specific)和“体裁的”(generic)。具体互文性指一个语篇包含可以找到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语,包括那些不加标明引用他人话语而产生的互文关系;体裁互文性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文体(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巴赫金将其称为“杂体语言”(heteroglossia)^[13]^[127]。费尔克拉夫认为,对于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的辨析是文本互文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具体互文性分析方面,话语角度可以被用作突破口,揭示某种意义表述是如何操控语篇读者认同作者所建构的社会身份和传递的意识形态;在体裁互文性分析方面,语体即体裁可以作为切入点,以展现语篇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文本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变迁^[14]。通过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章程文本中语体与话语角度的分析以及它们之间的搭配组合,我们发现章程制定者成功地运用了具体互文性和体裁互文性两种互文手段,向读者呈现了大学新型的外部治理格局,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形成此种格局的主流意识形态:新加坡社会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集权化思想作为一股潜在力量制约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加坡大学治理理念的现实路径选择,即政府在适当放权、大学获得自治的同时从来也不会放松对大学的引导和管理。

1. 大学与市场——体裁互文性的视角。在批评语言学里人们经常用“话语殖民”(discourse colonization)或者“话语霸权”(discourse hegemony)这

两个词来比喻不同体裁或者文类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这种影响与渗透表现在语篇中就是“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即不同体裁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搭使用^[13]^[152]。从章程7和章程8对学校的赠与和捐赠基金使用的各项规定中,我们发现招标(solicitation)、投资(invest)、投资委员会(investment committee)、稳定收入来源(consistent stream of income)、获取收入(earn income)等商业领域的词汇充斥在章程这样的教育法规语篇中,这种现象反映了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话语对教育话语的殖民趋势。这就是不同体裁的典型特征在同一语篇中的混搭使用,即语篇的体裁互文性。章程文本这种体裁的混合使用正折射了新加坡大学公司化改革的社会背景。200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司化法案》提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政府全资投入的法人机构转向有担保的企业型责任有限公司,大学变革为企业化大学后,对法定机构的有关规定和限制就不再适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被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大学在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风险,需要不断接受政府的问责^[15]。进而言之,当商业话语的殖民趋势置于大学公司化改革这一具体的社会情境时,高校的营利行为和商业活动在章程中得以合法化和制度化。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言语体裁能比较直接地、敏锐地、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是联结语篇与社会语境的桥梁。”^[13]^[138]

2. 大学与政府——具体互文性的视角。具体互文来自新加坡教育部1980年颁布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2001年修订),这个外部法界定了大学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弱化政府控制,强化大学自治,是对大学自治身份的认同。章程旨在宣扬大学自治的理念,对这个法案最基本的原则或政策方针加以引用并转化是必然的事。我们认为,章程对政府出台的基本法案的互文是界定大学与政府关系的重要策略。

章程7中规定学校具有管理和控制基金的唯一权利(the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sole right to...),唯一具有了排他性,意指大学拥有完全独立的财务自主权,不受政府的制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第7部分是这么表述的:大学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任意(All moneys paid to the University... for all or any of the purposes)支配各种款项^[16]。章程和教育法的语义呈现角度具有高度一致性(话语角度一致):都强调了大学拥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可以管理使用自己的经费,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在这段互文性

中,大学自治的身份通过 *sole right* 和 *any of the purposes* 两个词被建构并被合法化。正如 Fairclough 所言,互文性与权力有紧密的关系,尤其法律语篇是权力的表达,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符号功能^[17]。

陈永国对克丽丝蒂娃的互文概念重新做了阐述,“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撰的。可以说,互文性这一语言现象具有意识形态传递功能。”^[18]《新加坡国立大学法》第7部分明确指出财政部长应该不时地把议会拨给大学的资助以基金的形式如数拨付^[16];章程规则12指出政府对国大捐赠基金保持1:1配套资助的原则,并将政府配套资助累加到国大捐赠基金中,甚至根据捐赠用途提高资助配比,比如捐赠用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1.5:1)或者促进诸如国大耶鲁学院这样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3:1)。从这段互文我们可以发现章程在呈现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时做了适当的扩充和调整(话语角度的修正):政府不仅充当了服务购买者(*service purchaser*)同时又是一个促进者(*facilitator*)^[19]。具体来说,新加坡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呈现出了两个新的动向:其一,虽然实行了公司化改革,政府的拨款仍然是新加坡公立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04年,国大、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大学捐赠基金合计约为17亿美金,私人捐赠和基金投资收入目前只占到了三所公立大学总常规收入的0.3%~2.7%。教育部的经费在大学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为75%^[20]。新加坡政府把充足的财政资助看作是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政府有充足的财政预算去确保国大和南洋理工去追求卓越并跻身世界一流的行列^[19]。其二,通过政府对大学捐赠的配套资助可以洞见政府角色职能的转变:随着大学治理和资助体系的改革,新加坡政府逐渐从直接干预的控制者转变成远程遥控的促进者,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与奖励为大学追求卓越营造一种更有利的竞争环境。政府的配套资助属于一种激励机制,在这种激励框架下鼓励大学加大筹款力度,建立与社会的广泛联系,积极寻求和拓展经费来源,例如提高高校从捐赠和基金会等第三方吸纳资金的能力来辅助其目标和任务的达成。同时,为激励捐赠者积极捐赠,推动新加坡正在萌芽的慈善文化,政府还提供了各种捐赠命名机会,以允许大学可以更为确定地获得潜在捐赠。

总之,大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在不同的国家,政府、市场对大学的作用迥异,

大学自身权力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大学、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大学不是政府和政治领域的延伸的信条,要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政府的角色要适当,市场的边界要合理^[21]。新加坡虽然属于典型的遵循市场逻辑、秉持市场经济发展加速论理念的国家(*market-accelerationist state*),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和大学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新型关系样态,既不同于传统的政府计划干预,也不同于完全自治。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的宏观管理和外部引导确保了大学成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有效地抵制了市场机会主义,这证明了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完全被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所淹没^[22]。

四、结语

批判话语分析自问世以来就致力于揭露和最终摧毁不平等的控制与从属关系,以及权力滥用造成的不平等^[23],尤其在官方政策文本中它一度发挥着“批判”的功能。但是,随着其在各个学科的广泛运用,它的功能也开始发生转向。在章程文本分析中,批判话语分析的作用不一定一味地聚焦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权力不对等关系的揭露,研究者不能总去寻找文本的话语矛盾作为切入点。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成为沟通章程制定者和教师、学生、行政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和社会的重要渠道。批判话语分析主张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话语分析不仅是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一种干预现实、建构现实的工具。理解章程文本意味着理解章程产生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探索章程制定的语境、过程与文本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意味着更好地理解章程在建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在后资本主义语境下章程文本如何作为“透镜”去表征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今后批判话语分析的重要任务。

(张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高益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参考文献

- [1] 王 熙.批判性话语分析对教育研究的意义[J].教育研究,2010(02).
- [2]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London: Longman, 1992: 73.

- [3] Williams R.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
- [4] 杨惠中.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02: 160.
- [5] Ruth Wodak, Michael Meyer. 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1: 6.
- [6]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2nd edi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4: 362.
- [7] 周光礼, 袁伟. 多伦多大学的修订对我国教育立法的启示[J]. 江苏高教, 2009(01).
- [8] William Saint. Guiding Universities: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around the Globe [EB/OL]. (2014-03-07)[2015-01-23]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HDOFFICE/Resources/5485726-1_239047988859/University-Governance-and-Management-FINAL-Revised-2-Feb-2010.pdf. 2009: 5-13.
- [9] 王洁. 法律语言学教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44.
- [10]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9: 3-4.
- [11] Thomas L, Wareing S, Singh I, Peccei J S, Thornborrow J, Jones J. Language, Society and Power[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0.
- [12]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the Nove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9: 37.
- [13] 辛斌. 批评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14] Fairclough N L.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64.
- [15] Charles J Russo.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Law[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Education, 2013: 277.
- [16]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ct and Constitution revised edition. 2001[EB/OL]. (2014-04-02)[2015-01-23] <http://www.nantah.info/index.php/%E6%96%87%E5%AD%97/234-nus-act?path, 4>.
- [17] Fairclough N L.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Oxford: Polity Press, 1992: 102-103.
- [18] 陈永国. 互文性[J]. 外国文学, 2003(01).
- [19] Mok Ka-Ho.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Changing Governance in Chinese Societ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CERC) 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C]. Michael H Lee, Saravanan Gopinathan. Centralized decentr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eries CERC Studies in Comparison in Education. 2003, 128-130.
- [20] 王喜娟. 东盟高等教育政策丛书: 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高等教育政策法规[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05, 114.
- [21] 陈洪捷, 施晓光, 蒋凯. 高等教育文献讲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46.
- [22] Ka Ho Mok. The Quest for Regional Hub of Education: Searching for New Governance and Regulatory Regimes i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Malaysia[C]. East-West Senior Seminar on Quality Issues in the Emerging Knowledge Society,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9: 3.
- [23] 孙亚. 隐喻与话语[M].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3: 65.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the University Charter

——The case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Charter

Zhang Huanhuan Gao Yim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result of “linguistic turn” in socio-science and “social turn” in linguistic research, beca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method in educational studi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extually orient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romoted by British sociolinguist Norman Fairclough, this paper applied his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to the university charter analysis, putting forward specific and feasible steps with the aid of computer corpus techniques. Then, NUS Charter is chos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genre, style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ality and intertextualit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NUS.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US Charter; modality; intertextuality